



从法国看日本民俗(民族)学

[文章编号] 1001-5558(2010)04-0092-07

●[法]安娜·布希(Anne Bouchy)撰 鞠熙 译

[摘要] 本文作者自 1972 年开始接触日本民俗学,不断来往于法国和日本之间的独特研究经历,让作者在本文中形成内外交织的理论视角。本文首先介绍了日本民俗学自建立之初以来的理论基础、主要范围和重大问题,然后从个人的研究经验出发,解释这一学科的实践内容,以及国际合作方式对研究带来的影响。最后,本文再次思考了人类学中重要的“主位”和“客位”概念,“主位”和“客位”问题不仅是日本民俗学面临的问题,也是民俗学和人类学共同面对的理论问题。

[关键词] 日本民俗学;日本民族志;外在性;内在性

[中图分类号] K890

[文献标识码] A

本文作者在日本进行了三十多年的研究(原文中关于作者进入田野的具体过程部分,

[基金项目] 本译文成果属于译者参加的教育部人文社科重大项目“中国民俗文献史纲要”的辅助性成果,项目编号 02JAZJD840003。此译文是作者法文书稿一部分的翻译,原题目为《日本民俗学:由谁、从何处、如何进行》,征得作者的同意发表,所有删节之处,均在文中注明。原文见:Anne BOUCHY ‘De l’ethnologie du Japon’ Par qui, où, comment’, Ateliers 30, Nanterre, Laboratoire d’ethnologie et de sociologie comparative, Université de Paris X, 2006, p63~99, En ligne sur le site de la revue Ateliers。全部原文,将在不久后由法国远东学院北京中心出版单行本。作者的观点是,当年柳田国男创立民俗学时,“民俗学”和“民族学”没有根本的区别,而日本的“民族学”研究主要是由“民俗学”来承担的。作者考虑到法国读者对“民族学”和“民俗学”有不同的理解,故选择了法文中的“民族学”来指称日本的民俗学,但从中国读者的角度出发,以及从日本民俗学的实际情况出发,译者认为,直接理解为“民俗学”更为恰当,故本文仍译为“民俗学”。译者希望通过这篇译文,了解欧洲学界观察日本民俗学的看法,同时也能引起中国民俗学者的关注,对与日本民俗学史联系密切的中国民俗学史有新的思考。

西北民族研究

N. W. Journal of Ethnology

2010 年第 4 期(总第 67 期)

2010.No.4(Total No.67)

本译文暂略)她有两个目标:一是从法国观察日本学者作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结果,二是使日本学者了解法国同行的学科进展,促进日本的内外部研究。这二者的结合,使作者既从二者获取信息,也面向二者产生成果。

日本民俗学,作为“面向自我的民俗学”,直接继承了20世纪初日本民俗学者研究与编纂的大量成果,同时也获益于日本文献史中长期的反思传统。同时,日本民俗学也关注从19世纪开始的变化,了解到一些概念,如“复杂社会”(société complexe)、“全球化”(globalisation)、现代化(modernisation)、西方化(occidentalisation)和现代性(modernisme)等。事实上,它们既是事实,也是持续不断的研究与争论的对象。在这种语境下,作为非日本的研究者与日本本国学者开展合作,融合“自我民俗学”和“他者民俗学”的可能性,成为一个尖锐的问题。

一、柳田国男的正反观

日本民俗学,是“研究日本人民风俗的学问”,它首先是关于现在的科学,即“现在学”(既是现在的科学,也是关于现在的科学),这一点使它和研究日本的学问,或研究域外的学问区别开来。如果说它开创了新的研究道路和新的研究领域的话,那么它也同时植根于当时意识形态中的“国家—民族”概念。柳田国男的学术遗产(36卷全集,尚未计入无数的搜集作品、合著等)是日本民俗学思考问题的基础。在他身后,日本学术界从未停止过对他的学术遗产的重读、重编、评论、致敬和批评(有时是很轻率的)。只需略看日本民俗学会会刊,翻阅年会讨论报告或近期著作,就能发现,几乎所有研究者都将这一日本民俗学奠基人的观点作为自己研究的起点,或至少是选择引用。他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分析过程、研究成果等,一直都是后来难以计数的研究、反思和现代新作品的首要参考。对于非日本学者而言,如果想要了解日本同行的立场,也必须经由理解柳田国男这条路。从某种角度来说,在今天,身为“保护神”的柳田国男,与“柳田国男的民族学”(或称“柳田国男的民俗学”),无论是在日本内部,还是在日本外部,都成为该学科认识世界和自我更新的不可逾越者。如果说他的学说使新的研究变得更加沉重、形式主义,并阻碍了学科的进步的话,那么他的学说也从未停止过刺激、产生新批评观念,从而促进了学术的发展。^①

二、翻译、概念和语境

1954年,为反思“人类学在社会科学中的位置”,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等指出,民俗学(folklore)实际属于人类学的范围,关于此点,可以通过它的研究对象判断,或者通过它的研究方法断定(或者同时通过这两方面)。同年,日本人类学家窪德忠(Ishida Ei-

^① 在这些研究中,我们可以列举一些很有原创性的代表人物,如坪井洋文(Tsuboi Hirofumi)、赤坂宪雄(Akasaka Norio)、上野和男(Ueno Kazuo)、岩本通弥(Iwamoto Michiya)、岩田重则(Iwata Shigenori)、子安宣邦(Koyasu Nobukuni)等。以下原文中关于柳田国男对欧洲理论的借鉴,在“自我”与“他者”之间构建此学科独立性以及由此引起的争论部分,本文暂略。

[法]安娜·布希(Anne Bouchy)撰 鞠熙 译·从法国看日本民俗(民族)学

ichirō)提出,应将“日本民俗学”纳入广义的人类学概念中,并认为,这是唯一能使民俗学走向成熟的机会。他希望通过人类学和民俗学的融合,更新柳田国男的历史研究方法,刺激日本民俗学者扩大学术视野,推进自身研究。他还进一步指出,民俗学应该在自身和其他人文社会学科之间,打通渠道,要把研究“他者”的民俗学和人类学放在首位。然而,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两个学科之间的区别,是“日本民俗学”概念的内在基础之一。这种不同学科的介入,会打乱两个研究团体。有些学者还放弃柳田国男设计并实践的历史主义研究框架。这一立场,实际已与此学科原本的研究目标相背离,最终导致了1957年民俗学研究所^①的终结。

无论如何,可以确定的是,被称作“民俗学”的这一学科,在其早期发展阶段,曾接近于西方的folklore,但在后来,它已越过这一阶段,成为研究现代社会中大众风俗的日本民俗学和民族志。但是,另一种情况是,在现代社会,仍将该学科称为“民俗学”,这是在冒险将所有这类研究引向只关注“遗留物”的方向,掩盖现实社会中的民俗的丰富性。在法国的语境中,就曾经有过类似的经历。

事实上,在法国本土进行的田野研究,在其产生之初,也曾同样被称作“民俗学”(folklore)或“大众传统研究”(traditions populaires)。但是,现在一般的情况是,它被称为“法国民族学”(ethnologie de la France)了。这是因为,一方面,这一学科在二战期间的意识形态与政治主张(尤其是为维希政府效力和民族主义的宣传)违背了反战的历史潮流;另一方面,也由于这方面研究方法的改变和研究范围的拓宽,“民俗”的概念,自上世纪50年代开始,已被法国学界放弃,尤其是被法国民族学者放弃。现在,在法国学界,已将从前称为“民俗学”的研究,包括搜集缺乏上下文语境的风俗与信仰的活动,以及对古代社会的遗存、对今日社会已消失的现象之研究等,都视为早期学术史中的一个阶段而已。^②而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民俗学的表述方式受到了冷落。

“民俗学”一词,在法国,已发生了语义的变化,在法国之外,此概念的使用,也有相当的局限与特指范围。根据这种情况看,我更倾向于用“日本民族学”来取代早期翻译的“民俗学”。当然,日本学者并不都了解法国的“民俗学”概念的转变,而且,在日本,“日本民族学”的翻译法,也不为他们所使用。因此,在某种情况下,我认为,可以根据柳田国男的观点,用“风俗研究”一词,来指称这一学科,或者直接使用他的三分法定义来界定民俗学,包括“习惯性实践、知识和精神事象的研究”,也可以更简单地称为“惯常事象研究”。如果我“日本民族学”的概念,就是指日本学者在风俗研究方面所进行的全部研究实践,无论他们的研究对象是本土社会还是遥远的他者社会。

三、乡土、群体调查和民族志

日本民俗学的田野调查,尤其是群体性的调查,都继承了柳田国男时期的民俗学构想。

① 在众多见证中,有2003年3月19、20、21日,由国家大众艺术与传统博物馆及法国民族学中心组织的“从民俗学到民族学:1936到1945年法国和欧洲的机构、博物馆和理念”国际会议。此次会议邀请了大量这一领域中的先行学者参加。

② 柳田国男于1946年创建。

调查产生了大量的民族志搜集作品,包括区域性的、地方性的和主题性的著作^①,还有相当数量的地方或国家的民俗资料索引和地图^②。但直到今天,还没有利用这些资料在全日本范围内进行比较研究,还没有产生整体性的反思著作。究其原因,可能是视角问题。柳田国男一开始采取的研究视角,后来被他的继承者所始终坚持,并作为指导方向。其实,柳田国男在1934~1937年间组织的集体性田野调查,是为了将某一区域或某一村庄看作一个整体进行研究,即将其看作“一个有机整体”,学者的任务是“阐释它长期传承的原因”,^③但日本的民俗学工作一直存在忽略总体的倾向:其术语、事象列表或调查的方式,在全国并不统一,其描述和归类的类型成果也不够客观。这些集体调查的最初动机,是要摆脱两种让人不满意的搜集方式:一种是由当地人进行搜集,倾向于将被调查区域看作一个封闭的整体。(柳田国男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标不是研究乡土,而是研究存在于并创造了乡土的那些事情,即“日本人的生活……或我们能从乡土居民的意识与感受中所学到的新的东西。”^④)另一种调查,是明治政府(1868~1912)和大正政府(1912~1925)作的“惯习调查”。这种调查把调查本身看作是破除迷信、移风易俗的工具,但结果正好相反,是将惯习作为“民族实体”的一种表达方式保存下来。

这种民族志调查在很多大学中都很常见。自1970年以来,在这些密集的搜集工作中所获得的结果,是至今可以看到的、相当可观的著作,但其中的大部分都缺乏研究和开发,原因是缺乏统一的整理,或者在当时就搜集标准不一,或者出版发行会涉及隐私问题。总之,这些调查资料还躺在那里。^⑤

四、变动与质疑中的民俗学者群体

在上世纪30~40年代的集体性调查中,开始了一个被称作日本民俗学“大发现”的时代(如发现“两墓制”)。但也许不能过分地夸大说,今天还能在日本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纯朴的新事物,包括未被记载的传说,不为人所知的信仰,尚未被研究的活动,或被忽略或被隐藏的地方文献等。在上世纪70年代,通过初步整理被柳田国男主义者忽视的领域,后来重步他之后,训练了一批研究者团队,揭开了当时尚无人知晓的修验道的面纱。山地和海洋构成某种“边界”,而搜集工作逐渐发现了与这类边界有关的象征系统。

① 这类著作今天已达到几千部。参见两卷本《文化人类学信息大全》,东京:日外アソシエーツ株式会社,1994、2000。此著作中几章提及日本的“风俗史、民族史”。

② 例如,“日本民俗地图”,已出版多个系列,展现了日本国土上不同风俗的地理分布。自1969年以来,此地图为日本文化省所不断修订。

③ 柳田国男.采集事业的第一步[A],发表于1936~1937年,收入比嘉春潮、大间知笃三等编.山村海村民俗研究[C].东京:名著出版,1984.

④ 柳田国男.国史与民俗学[A],发表于1935年,收入《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4卷).东京:筑摩书屋,1978.67.

⑤ 以下原文关于这种调查的具体技术,作者对修验道、稻荷信仰与志摩女渔民亲身调查的部分,暂略。

接近上世纪 70 年代末时,田野工作自身的改变,使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及其类型成为问题,并逐渐使一般民族志撰写形式和概念的修正成为必要。这类问题,同样也是当时欧洲民族学面临的问题,地方社区的解体,导致了混乱的状态,很多变化要求学者重新界定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关注焦点。当时,都市民俗学已经出现和发展,但走进乡村仍然是可能的,或者说,我们把乡村社区看作是经济、社会、文化的综合体,而它们还多少具有开放性和渗透性的话,接近这些社区仍然是可能的。但这种调查拒绝重组地方遗产的一切可能性。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当我自己开始带领调查人员进入田野时,我发现,被调查者开始越来越多地回答“那都是过去的事了”,或者说“不,这不存在”,或者说“我不知道”。某些问题已不再有意义,如内部与外部的交换。生产与沟通方式的改变,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在志摩,我们搜集到最后一代潜水女的资料,她们的女儿都受过教育并从事其他职业,已经再也不会通过闭气潜水来打捞海藻和鲍鱼了。原有社会系统的平衡性已经完全动摇,这些沿海贫穷村社的功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村社正在投向小型港口的旅游业。即使和不久之前相比,当地的被调查者也不再在社区群体中处于相同的位置。海洋渔业的规则,男女两性的关系,乃至男性和女性自我身份的建构,都重新成为问题。至于陪我一起调查的女学生们,她们被眼前这些妇女的生活方式的变化惊呆了,这是在返回的路上她们向我承认的。这些潜水女曾是古老传统链条上的最后一环,通过她们的存在,我们可以找到日本群岛的史前史的最初痕迹,但她们在本地语境中,在面对外部世界时,总能显出行为、语言和思想的自由性,因而群体内部同样也表现出接受现代行为的能力。这是我第一次感受到地方社区现实与 20 世纪初民族志调查之间的落差。自此之后,其他问题也陆续地出现,所有民族志调查者都或多或少地看到原有理论的局限性,认为应该重新思考框架、目标、研究方式和田野调查的客观性问题,并重新塑造接近对象的新工具。

在最后的二十多年中,坚持民俗学的旧有模式,会带来危险的结果。它所承担的风险,是将民俗学简化为仅研究“传统”的学科,将民俗学的研究对象定位在“底层文化”上,随后从现代社会的外部搜集材料,丢开历史中的当代部分,将国家和社会的某些方面,从其现实语境中剥离出来,凝固为理想化的嗜古图像。20 世纪初民俗学“大发现”全景图中常有这种僵化的信息,现在民俗学不再具有活力,只是泛泛地、粗略地进行“遗留物”再生产。某些研究工作被所在地的经济目标所引导,被工具化和被重塑,成为地方性传统“被民俗化”的支持者,遭到严厉的批评。民俗学证明,更大的危险还在于,这类工作随后会为地方传统贴上“文化财产”的标签,地方传统被标记为有形的和无形的财富。随之,地方权力、中央或区域性的行政机构就有机会进入地方管理系统中,并通过他们对文化的控制,归纳和形成整齐划一的社会现象,例如“遗产化”的风险。

五、外在性,内在性

今天,田野实践同时变得更加容易和更加困难。更加容易,是因为社会流动使接触更加迅速,也减少了开场白和介绍的时间;更加困难,是因为某一空间不再构成可探究的总体,因此,实际是调查者圈定和塑造了他的调查范围。

现在,我们已在接近日本民俗学的核心观点,它同时也是一般民族志工作的基础。这就

是,自这一学科开始,在还未有术语的时期,已存在居于中心地位的问题:外部与内部的关系,主位和客位的关系等。对于柳田国男而言,这为“当地人”进行民族学研究提供了合法性——只有他“移情”(empathie)的双眼,才是达到这一学科研究目的的唯一特殊途径。从这一概念出发引导出一个立场:地域性的调查必须由当地人主导进行,即只有日本人才能进行日本民俗学的研究。在柳田国男的某些著作中,^①曾使用了严厉的字眼批评外地人(指日本以外的外国人),认为他们没有移情日本,因而没有理解当地事象与话语的可能性(20世纪上半叶)。^②

然而,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外地人”的民族志调查开始兴起并得到认可,从那时开始,专题调查和研究中便记录了调查者与“当地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及其应用。接下来的阶段,一些民族志调查由外国的“非本地人”进行,当他们也作好柳田国男所说的“准备”时,这种调查便能被认可。另一些情况是,在那些开设民族学课程的大学所进行的调查中,总是日本学生和非日本学生共同合作。当然,这也是20世纪以来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社会变迁和沟通方式的改变所造成的结果。(即使在最偏远的村庄中,居民们在真地遇到“外地人”之前,也通过电视习惯了他们。)

写到这里,我想起记忆中两位妇女的惊呼。其中一位妇女,是从高知县到四国边境群山深处的村民,1974年,她问我:你是不是生在“这里”,在日本?另一位是千叶南部白滨地区的潜水女,1985年,她曾非常惊讶,因为我竟然知道“这里”——村庄过去发生的事情。这些妇女并不把我当作“日本人”,但仍然表示我所关心的事情与她们切身相关。虽然明知道我和她们之间存在明显的“外在性”,但确定恰当的问题,以通俗的语言针对实践本身提问,仍然创造了我们彼此接近的可能性。可见,现实情况与“内部/外部”的简单对立正相反。但这一观点在日本仍有市场,有时是因柳田国男对“外地人”的态度广为流传,但更普遍的情况是,这一观点被日本民族学者用来反对人类学:人类学强调外部视角是参与观察的必要条件,而日本民族学则声称只有“移情”,才能形成认同当地的“感情心弦”。其实,“外部”与“内部”是相对的,我曾听到各种类型的相似性或不同点,不仅存在于当地和外地的民族志学者之间,也存在于当地市民、当地村民、北方人或南方人之间,甚至存在于早期移民的后代和新移民之间。

或许民俗学的全部艺术就在于找到一个平衡点:一方面是浸入社会(这是必要的,当然其时长和程度都因不同研究者而异),在研究问题上与当地人整合;另一方面是与日本学术界共享研究,同时不拒绝从外部观察,也不自我封闭于“当地”视角中。后者,指的是某些日本学者的“萨义德式”(à la manière d'Edward Saïd)的批评方式。例如,有的调查者在面对田野时,会认为某些主题或课题要么显示出了“东方主义”的倾向,要么太“异域风情”,太“特殊”,或者正相反,太普遍或太抽象。

① 尤其是在《青年的学问》、《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的研究法》中。柳田国男《青年的学问》[A],发表于1928年,收入《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5卷),东京:筑摩书屋,1978,83~259。柳田国男《民间传承论》[A],发表于1934年,收入《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5卷),东京:筑摩书屋,1978,331~357。柳田国男《乡土生活研究法》[A](第25卷),发表于1935年,收入《定本柳田国男集》,东京:筑摩书屋,1978,261~328。

② 以下原文中对于柳田国男理论的具体描述,本文暂略。

如果说展示客观性是核心问题的话,那么仅有日本研究者提出的研究结论就不够。获得知识的条件、语境、研究史和提问题的方法,都同样重要,并应更好地为人所知。为了达到这一点,今天仍然应继续努力进行表达、翻译、田野和建立争论机制的工作,这些问题当然很宽泛,甚至能推广到所有文化氛围。但看来似乎只有学者之间的对话,才能同时避免民俗学研究的“民族中心主义”(建立在单一的西方研究范式基础上)和民族学者的“民族中心主义”(仅在某一国家或某种社会文化中进行的特殊研究)。我们仍然是向所有创造性成果敞开空间。

[收稿日期]2010-08-19

[译者简介]鞠熙,女,博士,法国高等社会科学学院(EHESS)博士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北京 100875

The Ethnology in Japan :A View from the French

Written by Anne Bouchy Translated by Ju Xi

Abstract: The author started the research of ethnology in Japan from 1972. Shuttling between Japan and France, this particular experience contributed to an interlacing “inner-out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This article firstly introduced the theoretical basis, the major scope and the most important controversies of the folklore study in Japan from its foundation. Then, based on the personal researching experience, the author explained the practices of this subject, and how the way of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fluences the results in this domain. Finally, this article reflects again the “etic-emic” concepts which are significant to anthropology research. They are not only the theoretical problem faced by the researchers in Japan, but also by the all the scholars of folklore study and anthropology.

Key words: the folklore study of Japan, the ethnography in Japan, exteriority, interiority

On the Folklore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Global Time : Obstacles, Strategy and Practice

Dong Xiaoping

Abstract: The folklore higher education has been the kernel of study of folklore. Its meaning, objects and the method of teaching changed a lot in the globalization era. The new generation of folklorists should adapt to these changes and improve the teaching quality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s. A folklore research and teaching team at th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as endeavored to find some ways to build the modern strategy of the folklore transmission such as digitalizing the folklore materials.

Key words: folklore higher education, a history of folklorists, modern strategy for folklore transmission(See P.83)